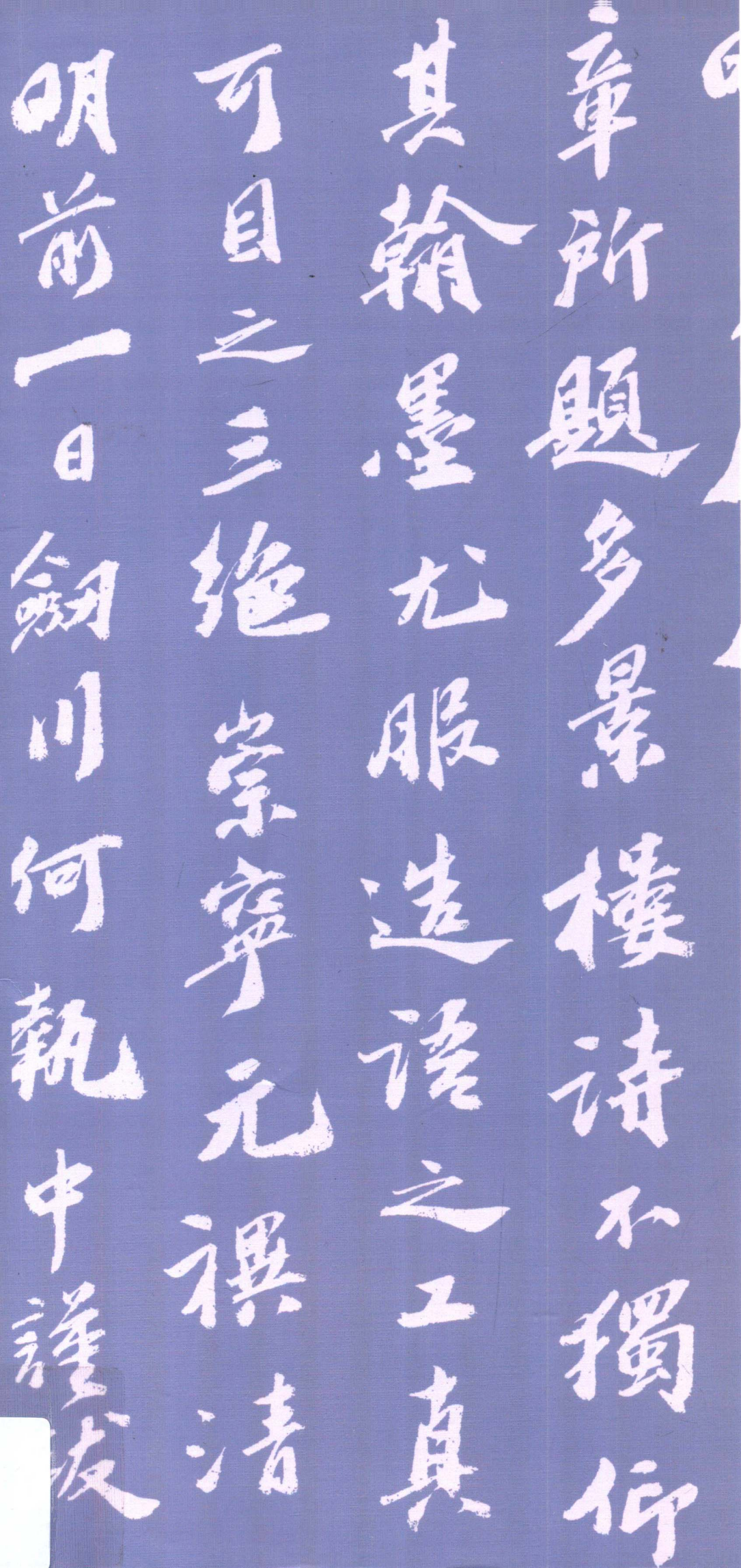


中国书法大师精品系列

米芾

梁培先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中
国
书
法
大
师
精
品
系
列

米芾

梁培先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书法大师精品系列. 米芾 / 梁培先著. -- 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480-1484-3

I. ①中… II. ①梁…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宋代 ②汉字—法书—作品集—中国—宋代③米芾(1051~1107)—书画艺术—艺术评论 IV. ①J222 ②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2224号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法律顾问: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作 者: 梁培先

责任编辑: 陈军 陈东

策 划: 北京艺美联艺术文化有限公司

中国书法大师精品系列——米芾

出版发行: 江西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南昌市子安路66号 江美大厦

印 刷: 北京翔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8

印 张: 41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0-1484-3

定 价: 180元

赣版权登字-06-2012-54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 录

米芾生平评述	1	(三)	33
(一)	1	米芾书画理论摘抄	309
(二)	5	主要传世作品年表	320
(三)	11	后人评价辑录	323
米芾艺术成就分析	13		
(二)	29		

米芾生平评述

米芾（1051—1108年），初名黻，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之后改作芾，字元章。生平所用斋号甚多：襄阳漫士、鹿门居士、海岳外史、淮阳外史、中岳外史、净名庵主、溪堂、无碍居士，晚年号米老。生于襄阳，成年之后定居镇江丹徒。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卒于淮阳军任上。

（一）

相传米芾的五世祖为宋初大将米信，其父米佐曾官至武卫将军，但米芾本人似乎对此并无用心，生平也绝少提到这个世系关系。在米芾的一生中，母亲阎氏曾为宋英宗皇后高氏的乳母——这个背景对他的影响最大。比如，米芾晚年曾为礼部员外郎，就有人指责他出身冗浊，不应占据这个位置。所谓出身冗浊指的就是其母亲曾为下人的身份；但这个背景也曾给他带来好处，米芾21岁时，宋神宗在位、高氏时为皇太后，没有科举功名的米芾得以任子身份授予校书郎，就是沾了他母亲的光。后来即使从雍丘卸任，还是以县令的身份监庙食禄。另外，母亲对米芾从事书画收藏非常支持。元祐前后，米芾的书画收藏刚刚起步，兼之官俸有限，多有捉襟见肘之事，母亲每每拿出自己宫中的赏赐

之物抵当了来资助他。所以，米芾对于母亲的感情在文字中也时有流露。

关于米芾早年的事迹我们了解的很少，只知道他幼年、少年都是在襄阳度过的。治平四年，米芾17岁时，宋英宗去世，皇后高氏孤寡，招米芾之母进京为伴，此时方随母亲迁往汴京，居于皇宫之内。到21岁出宫任官，米芾在宫中总共呆了四五年的时光。

从一个人成长的层面来说，这两段经历对于米芾一生人格、性情的塑造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襄阳旧属楚地，楚人多信巫鬼，成年之后的米芾喜欢阅读当时民间流行的一些手抄本的神怪小说，对于巫术、鬼神之说亦深信不疑，且性格荒诞多有楚人汗漫之风——这是早年的生活影响。而宫中的生活经历，尤其是母亲的下人身份，则使米芾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其生平周旋于政治党争的不同人群之中，多得各方的认可和帮助（当然，也曾遭受到许多的排挤），应是与这一段生活有关。用他的话说是：“庖丁解牛刀，无厚入有间。以此交世故，了不见后患。奈何触褊心，忿气益滋蔓。是非错相干，恶成那及谏。智者善持已，颇觉操修辨。此道固不远，可约亦可散。黄帝本斋心，斯民即晏粲。”可谓为夫子自道的处世经验之谈。举例来说，比如宋哲宗元祐之初，

王安石变法时代的历史遗产——新旧党争日趋白热化，属于旧党的苏轼在政坛上比较得志，而曾邀请米芾游历湖州的林希则为新党，当时被贬做地方官。米芾既尊苏轼为长辈，又接受林希的邀请，似乎并不属于哪一个阵营，也不在乎他们之间的政治斗争。这主要因为：其一，米芾终生都没有做过什么大官，进入不了高层政治党争的人物榜。其二，米芾始终对政治保持一种疏离的态度，他虽然比较在意官职的大小，但又似乎没有什么政治抱负、缺乏参与政治的热情。其三，为了使自己与新旧党人相区别，米芾还经常刻意表演一些奇行怪状，以示自己超然于外。比如，元祐年间，在京城他和苏轼、黄庭坚等旧党人士一起讨论文学书画，故意穿着唐人的衣装以示自己的独立性——荒诞之中实则带着几分刻意表演的成分。其四，最重要的是，米芾穿梭于新旧党人之间的“业务联系”大多是文学书画，顶多向他们求援弄个小官做做，没有什么事情与当时的政坛风云相关联。所以，新党中人如林希、蒋之奇、谢景温、吕惠卿、沈括等和旧党中人苏轼、黄庭坚、张耒、王洙、李之仪等都和他交情不错，没有人将他视为政治对手或者窥探信息的小人。因此，宋哲宗元祐之末至绍圣年间，苏轼及其门人一再遭贬，此时米芾却与新党的谢景温、蒋之奇等人打得火热。但宋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赦，回到江南之时最想见的还是米芾。而米芾也是热情招待苏轼，并在苏轼生病期间亲自给他送去药材。再如，苏轼去世后，新党的势力逐渐把持着朝政，米芾的

官场生涯也没有因与苏轼等人交往而受到过任何的影响。这些都说明米芾与政治党争基本是绝缘的，其为人立身确有圆滑老到的一面。

成年之后的米芾曾经做过一些官职，比如，21岁时授予校书郎、25岁时为长沙掾、34岁时曾任权杭州观察推官、38岁入淮南东路长官谢景温幕、40岁任润州州学教授、42岁任雍丘令等等。由于北宋官员的科举选拔制度已经非常完备，有无科举功名在官场的升迁、待遇等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而米芾一生都没有通过科举考试，所以，得任的这些官职都非常卑下，经常是时间不长就主动或被动离任了。期间，做得最长的官职是长沙掾，也不过只有五六年的时间。

当代米芾研究领域流行着一个观点，认为米芾仰仗着高皇后的关系，所任官职皆为俸厚而清闲的职位。这个判断不符合事实。考察《宋史》，高氏的政治影响力主要集中于宋神宗即位的早期和宋哲宗即位最初的8年（元祐八年即1093年，高皇后去世）。神宗虽为高氏之子，但母子之间的政治主张差异颇大。一旦神宗亲政，高氏就不得不退居幕后；在后一个时期里，也是因为哲宗即位时年仅十岁、高氏曾以祖母的身份垂帘听政。元祐之末，高氏年迈，此时的哲宗已不再接受她的约制了。这些史料证明，即使高氏确曾“照应”过米芾，也不可能自始至终的。最重要的是，正史的记载并不支持高氏曾经利用其地位，恩荫自己身边人的观点，倒是相反的证据颇多，比如《宋史》卷二百四十二·列传第



湖北襄阳米公祠

一记载：“后弟内殿崇班士林，供奉久，帝欲迁其官，后谢曰：‘士林获升朝籍，分量已过，岂宜援先后家比？’辞之。”又，“侄公绘、公纪当转观察使，力遏之。帝请至再，仅迁一秩，终后之世不敢改。又以官冗当汰，诏损外氏恩四之一，以为官掖先。”再有“宋用臣等既被斥，祈神宗乳媪入言之，冀得复用。后见其来，曰：‘汝来何为？得非为用臣等游说乎？且汝尚欲如曩日，求内降乾挠国政耶？若复尔，吾即斩汝。’媪大惧，不敢出一言。自是内降遂绝，力行故事，抑绝外家恩。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钜细，终身不取其一。”等等这些事例证明高氏并非是一位惯常私恩的执政者。

对照米芾于高氏在世时期的官场任职履历，则更能够说明问题，最初的授予校书郎和任长沙掾的确得益于恩荫，但是，在此后的三四年里米芾却一直无官可做，而此时高氏不仅在世，且正秉权杖。期间，

米芾求官之心未曾懈怠，不然就不会有元丰之末专程赴金陵候官、顺便拜会王安石之事。此已说明高氏的荫庇之力非常有限，毕竟，米芾只是其乳母之子。再如，米芾38岁入淮南东路长官谢景温幕，而“景温雅善安石，又与安石弟安国通姻”（《续资治通鉴》），在政治上属于高氏的对立面。此时高氏尚握权柄，米芾不避嫌疑、寄职于谢之门庭——这多少是犯忌的。合理的解释是，此时米芾母子出宫已久，与高氏的关系早已疏远，所以，也就无所谓政治派系的问题了。

关于俸厚而清闲的说法也有必要一并澄清。比如，米芾最早任职的“临桂尉”、“长沙掾”只是北宋官场最基层的职位，既不可能俸厚，也不应当清闲，查看一下马端临《文献通考》中有关职位的职责、俸禄记载自不难明见。再比如，米芾于元祐初年任职的权杭州观察使推官，“观察使”或为虚衔，一般由宦官、贵戚们遥领着，但推官却不是什么闲职。欧阳修、苏轼等人入仕之初也都做过推官、通判之类的幕僚官，这一类官员不仅要管文书、钱粮、诉讼，甚至赈灾、救济等事也是他们的职分——并不清闲。至于杭州一地，与米芾同时、专门写谥墓之辞的孙觌说：“（杭州）号天下绝境，守将领客出邀，相踵以为故常，而委事于其副”——推官之类的幕僚官穷于官场往返、其公务繁忙是可以想见的。另外，宋神宗元丰改制之后，取消了各类文武散官，官名即是实际职责，看其官即知其职事、职权。到了后来的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更规定，知州、通判、

幕职官须每日在知州办公处办公，当场签
定文书。至于其他文字，则先由幕职官撰
写、详审，送通判、经知州盖印方得实施。
因此，可以肯定，米芾所任之“权杭州观
察使推官”——多了一个“权”字的“临
时工”，更非什么官闲禄厚。同时，通过
米芾的一些文字也可以见出，“权杭州观
察使推官”这个位置他待得似乎也不舒服，
在《萧闲堂诗》序言中他说：“然今乐善君
子一何多耶？彼口不道忠信，捷捷而恶人，
翩翩而自喜，默默怀奸藏匿，窃窃掩人之
善，咕咕自标置者，得不少悛乎？”，联
系这篇序言的前后文和米芾当时的状态，
所指非常清晰。再如米芾后来所任之雍丘
令，时见胥吏催租逼人，愤而作诗：“一司
日日下赈济，一司旦旦催租税。单杖请出
三抄纳（敝邑以身当夏税之责不令受赈时
催），百姓眼中聊一视。白头县令受薄禄，
不敢鞭笞怒上帝。救民无术告朝廷，监庙
东归早相乞。”作为一县之令，米芾在催
收租税的工作中肯定要负一定责任而不
可能超然物外。这种差事对于他来说，俸
禄无多却烦恼颇多，更谈不上什么清闲。
也就难怪，做了两三年的雍丘令后，虽是
缘于常平官诉讼之事而面临尴尬，但米
芾心中早已厌倦了这个职位，所以，干脆
乞监祠了。以上诸例，都是发生在高皇后
权势隆盛的时期，果有后宫的照应，这一
时期的米芾何必如此辛苦呢？

宋徽宗即位之后，米芾的仕途交游才
算稍微展开，所任官职虽不免忽露忽沉，
但有些职位还是有些层次的。不过，此
时高皇后早已不在人世了。米芾的官运

勉强有所转机是在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
年）以后。当年，他的老朋友蔡京任职翰
林学士承旨之后，虽然他只得到了一个小小
的涟水令，但是，通过蔡京的引介，米芾
在京城结交的权贵们终于在元符三年（1100
年）为他谋得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司管勾文
字的职位。这个职位虽然未必清闲，但毕
竟是在制置司的大衙门中任职，“派头”
还是有的。后来，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蔡京复为龙图阁学士之时，米芾得以
任职于真州转运司。北宋各路转运司都是
肥缺。真州位于由江南到汴京的大运河咽
喉要道上，为北宋南北钱粮物资转运的汇
集枢纽，转运司中的职位是许多人求之不
得的。次年，蔡京任翰林学士兼修国史，
米芾得任蔡河拨发。蔡河为汴水的支流，
离开封不远，也是南北调运的关键位置——
蔡河拨发的职位应该也不差。直至蔡京把
持朝政即米芾最晚年时期，得任书画学博
士之职，都可以隐约地见到蔡京的影子。特
别是书画博士一职，虽然官职不高，但赶
上喜欢字画的宋徽宗，成为皇帝身边的人，
米芾的职场生涯还算比较舒坦（有的学者
甚至认为，这个职位是蔡京帮忙专门为米
芾设立的）。这一时期里，依靠官场上的
朋友们和皇室贵族的关系，米芾所任官职
多少才能谈得上俸厚而清闲。但由于米芾
天性不适合在官场上厮混，兼之没有功名
出身，即使这些俸厚清闲的职位也大多做
不长，就被弹劾落职了。所以，《宋史》说
他：“从仕数困”——这些背景关系也有
帮不了他的时候。

值得注意的是，宋徽宗时期的政坛已

多为小人所据，特别是到了米芾的晚年时期，蔡京可谓权势熏天。但是，如果据此认为米芾是蔡京的帮闲，则肯定冤枉了他。他与蔡京有老交情不假，但在蔡京的眼中米芾只是其书画友——一位行为举止略显荒诞好玩的奇人，有时会耍无赖，有时又颇有情趣，但终是不伤大雅，更不可能成为他的政治敌人。对于这样的朋友，偶尔帮帮他也无妨。而米芾也似乎拿准了蔡京的脉象，有时厚点脸皮去讨个官职，有时则奇行怪言、非常风趣，于己于人都是坏事。而且，为了官场的职位，米芾还和章惇、曾布、赵挺之、吕大防等当时政界的重要人物们有交往，这些人清浊不一，即使同为浊类，也是“山头”不一、彼此倾轧。米芾游走于其间，本无所谓政治立场可言。

总体来说，米芾一生为官的经历并不算得意，总的时间也不算太长，大概占他成年后的一半时间。在不停地做官、丢官又很快通过关系找到新职位的过程中，做官对他来说已越来越成为一种生存手段，而不是人生追求，更谈不上施展什么政治抱负了。最糟糕的是，官场中沉沦下僚的曲折磨砺，使他在中晚年时期养成了尸位素餐、不务正业的坏习惯。据《宋稗类钞》记载：

“米元章守涟水，地接灵壁、畜石甚富，一一品目，加以美字，入室则终日不出。时杨次公（杰）为察使，知米好石费事，因往廉焉。至郡，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付公，汲汲公务，犹懼有阙。那得终日弄石？’。米径前以手于左袖中取一石，

其状嵌空玲珑，峰峦洞壑皆具，色极清润。米芾举石宛转示杨曰：‘如此石安得不爱？’杨殊不顾，乃纳之左袖。又出一石，叠嶂层峦，奇巧又甚，又纳之左袖。最后出一石，尽天划神镂之巧，又顾杨曰：‘如此石安得不爱？’杨忽曰：‘非独公爱，我亦爱也。’即就米手攫取之，径登车去。”

这段记载说的是米芾守涟水时期的事情，当时他已经快50岁了。文中提到的杨杰，根据《宋史》记载，应是一位比较正面的人物。连这样的顶头上司都不再纠缠米芾荒废公务之事，除了同有爱石之癖外，另一个原因是二人之间有着许多年的交情，算得上是老朋友，杨杰非常了解米芾的习性，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别把老朋友的“饭碗”给搞丢了。米芾晚年为官之昏聩，想来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二）

“臭秽功名皆一戏，好艺心灵自不凡。”米芾生平精力主要集中于书画收藏和书画创作上。关于他的书画创作，我们将另文讨论，在此只谈与他的书画收藏相关的事情。

北宋自宋真宗、仁宗先后与辽、西夏签定和约之后，迎来了整个两宋历史中难得的近百年太平时期，文化艺术在此期间逐步走向了鼎盛，并代表了两宋最高的创作水准。特别是宋仁宗即位之后，书画或与书画有关的文房收藏之风非常炙烈。搜求古书画、在书画世界中徜徉不仅是名公



英光堂法帖中的米芾

巨卿的奢侈性爱好，而且到了宋仁宗中期以后，已扩散成为当时朝臣们乃至一般读书人最广泛的风雅之举。米芾生逢其时，他早年的几位朋友如魏泰、刘泾都是在当时的书画收藏界活动非常频繁的人物，相比较，米芾正式进入这个领域的时间则迟后了许多。

米芾早期的书画收藏只能算是一般的“票友”，大概只收了一些如欧阳询的行书刻本等当时并不罕见的种类，而且主要是受魏泰等人的影响。由“票友”到“专家”的“转型”得益于和苏轼的会面。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四月，米芾卸任长沙掾一职经黄州回开封候补，苏轼恰好因“乌台诗案”被贬于黄州，任团练副使。在黄州，两人实现了生平的第一次会面。当时，米芾32岁，苏轼则已47岁，算是他的师长。初次见面，苏轼出示了自己所藏的吴道子佛像画，规劝米芾多于晋人书法处用功，还要多临多看古人的真迹，并给米芾表演了墨竹的画法。

对于这段史实，一般的研究者只注重苏轼劝米芾学习二王之语，往往忽略了相关的其他背景。比如，苏家自苏轼之父苏洵即开始留意佛像画的收藏，苏轼本人亦特别关注吴道子的作品，他曾自诩：吴道子之画，一望而知其真伪。另外，苏家的姻亲石扬休是当时北宋的大收藏家，石扬休之子石庚夷在宿州为官，后定居于此，并建有“石氏画苑”以储藏家中的藏品。苏轼生平曾九过宿州。其他的如苏轼在各地为官期间皆曾留意金石字画的鉴赏问题。这些都说明，苏轼虽算不上当时的大

收藏家，但苏轼过眼的书画作品数量应是相当可观的，其眼力、识见绝非泛泛之辈。与这样的高手“过招”，带给米芾的震撼是可以想见的。所以，苏轼的忠告米芾终生牢记在心，对于二王书法的搜求与实践占据了米芾一生相当部分的光阴。从黄州至金陵，后来再到杭州做观察使推官的几年里，米芾就已收藏到一些古人的书画作品，但数量质量都不足。在杭州的几年间，通过关景仁、王涣之等朋友的帮助，米芾的收藏事业总算是开始起步了。但这时母亲去世，米芾只好护送母亲的灵柩回镇江丹徒——在那里有他用灵壁石和前朝大收藏家苏舜钦后代交换的一处住宅。即使是护送灵柩的过程中，米芾仍念念不忘路过苏州拜访一下苏舜钦的后人，观赏苏家的字画收藏。因为此一苏家是北宋首屈一指的大藏家，自远祖父苏易简至于孙儿辈的苏舜钦、苏舜元以及重孙辈的苏洵、苏液，奇货重宝、代代相传，其质量、数量、规模绝不逊于石氏画苑，米芾怎肯放过？果然，元丰七年（1084年），米芾终于从苏洵那里获得了王献之《十二月帖》这件真正的晋人作品。至于两年以后，米芾在镇江丹徒守孝期间所著的《宝章待访录》一书中，他向人们展示了更为宏大的收藏晋唐法书的决心和计划。同时，通过该书中目睹部分的陈述，我们也可以见出此时米芾耳闻目睹到的晋人书帖的数量已是非常惊人——与苏轼别后短短的几年里，米芾于字画收藏、鉴赏方面已实现了量与质的飞跃，其用心可谓专而精。

此后的人生里，米芾与当时或大或小

的收藏家如石庚夷、苏澈、薛绍朋、刘泾、安师文、驸马王洙、太监刘瑗、宗室赵伯充、赵仲爱、赵仲忽，以及喜爱字画收藏的官僚蒋之奇、蔡京、谢景温、沈括、曾布等等都保持着非常好的私人交往关系，或向他们索取古书画，或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收藏品，或干脆仿冒假字画、偷梁换柱，等等手段可谓是五花八门。

比如，米芾《宝晋英光集》卷六《李邕帖赞》记载：

“右唐秘书李邕字泰和书。光王瑑，元宗皇帝之子；濮王翊，太宗皇帝之曾孙。故紫微舍人石昌言所藏。元祐丁卯过甬上，遇紫微孙夷庚字坦夫，以张萱六画、徐浩二古帖易得。尚有历少府求地黄帖白麻纸，在石氏。坦夫，幼安长子，书画号翰林苑。苏子瞻为之序。此帖飘纵，后帖谨严，余欲此帖，坦夫惜不与。幼安程氏夫人于户间使以归余焉。六月南都舟中装。”

根据笔者对相关史料的辨析，此次与石庚夷的字画交换，米芾拿出的“张萱六画”根本不是唐人张萱的真迹而是摹本。而石庚夷之所以不愿意将李邕的《光王帖》也换与他，是因为此帖也是摹本。换句话说，石庚夷的不愿交换是心存善意，而米芾则心知是假货却又打着吃亏到底的招牌“以次充好”。正是有此的无赖手法，米芾从事字画收藏不久，藏品、阅历固然在长进，但外界的负面影响也在“长进”。就像黄庭坚说的：“巧取豪夺”、“声名籍甚”——这个名声似乎不太好听。

米芾在当时字画收藏界声名籍甚的另一个原因是经常做假字画。《书史》“唐颜太师不审乞米帖”条目说：“余少时临一本，不复记所在。后二十年宝文谢景温尹京”，谢景温告诉米芾有一郭氏人家收藏此帖，并欲出售，米芾往观，发现竟然是自己此前的临摹本。谢景温以宝文阁大学士知开封府是在哲宗元祐元年及元祐二年，元祐二年七月米芾正好到了京师。前推20年，米芾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竟能如此做假，虽不免自我吹嘘，但好在还算诚实，并不回避自己的作为。事实也是，元祐初年，米芾第二次来京城时，就伙同驸马王洙一起做过假字画。当时同在京城且与米芾、王洙交好的苏轼、黄庭坚想必也都知道这件事。

因此，有些收藏家对米芾持不欢迎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据南宋范公偁《过庭录》记载：

忠宣旧藏一江都王马，往年自庆赴阙，李伯时自京前路延见求观。忠宣云：“某非客，但道路难为检寻，俟至阙未晚。”李日夕恳之甚力，寻出。李见之，称叹失措，借归累日，用意模写，竟不能下手。复还之，但以粉牌榜其上云：“神妙上上品江都王马。”云：“某看之累日，不能下笔，聊留数字，以见归向之意。”时米元章作郎，每到相府求观，不与言，唯绕屋狂叫而已，不尽珍赏之意。

文中的“忠宣”是指范公偁的祖上范纯仁，他是范仲淹之子，与米芾同时代。

李公麟想观赏范纯仁的藏品，人家好歹还是借给他；轮到你米芾张嘴，连门都没有。

米芾对于古字画非常痴心，上文所引“唯绕屋狂叫而已”，即可以见出一斑。另一个例子是，元祐之初，米芾第一次通过好友王涣之的引见，去检校太师李玮家中，见到了李玮所藏晋贤十七帖时，感叹道：“当时倾笈换不得，归来呕血眼生花。”是眼馋嫉妒？还是自愧不如？总之，有些内火攻心、把持不住了。

凭心而论，米芾从事字画收藏痴心是痴心，“巧取豪夺”的事情也有，但也绝非全部靠耍无赖混来的。在米芾的藏品中有相当部分是节衣缩食买来的，比如张僧繇的《天王图》、王羲之《桓公破羌帖》等等；有些则是以物易物的形式换取的，比如褚摹《兰亭》、王献之《十二月帖》；有些是通过朋友的关系搞到的，或者朋友赠送的，比如薛绍朋赠送的王羲之《丙舍帖》。这几部分应当是其收藏的主体。即使那些“巧取豪夺”的东西，米芾也绝非无赖到底，而是看人行事的。而在当时达官贵人的眼中，像米芾这样讹点字画的行为，不仅不会伤害彼此之间的交情，有时还会觉得米芾这个人非常有趣。比如，米芾就曾演戏、用“你不给我，我就投水自杀”的方式从蔡京那里讹到了王羲之的珍品，蔡京似乎并不生气，不仅痛快地将作品给了他，而且还在日后的官场上帮助过米芾。

关于米芾的收藏，杨春晓博士曾做过一个大致的统计：至于崇宁二年（1103年）米芾收得王羲之《破羌帖》为止（此年米芾53岁），仅晋人书帖，他已收藏了王羲

之《王略帖》、《尚书帖》、《初月帖》、《官奴帖》、《官舍帖》、《丙舍帖》、《快雪时晴帖》、《与王述书》、《十七帖》、《兰亭序》三种等等，另谢安、王献之、虞世南、褚遂良等等法帖若干。用他自己的话说：“余家收古帖千轴”，对于一位私人藏家来说，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书法之外，米芾所收古画数量、质量亦颇客观。米芾自谓收“古画最多”，到底有哪一些呢？据明人张丑《清河书画舫》记载，包括：曹不兴《如意轮》、顾恺之《净名天女》、戴逵《观音》、薛稷《二鹤》、王维《雪景》二幅、韩幹《调马图》、荆浩《夏山图》、董源《雾景》、李成《松石》、范宽《秋山瀑布》、巨然《海野图》等等皆是旷代绝迹。

米芾还嗜奇石，上文提到的他与杨杰的故事是一例，另据《宋史》列传第二百三文苑六记载：“无为州治有巨石，状奇丑，芾见大喜曰：‘此足以当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所以，元倪镇有《题米南宫拜石图》诗说：“元章爱砚复爱石，探瑰抉奇久为癖。石兄足拜自写图，乃知颠名传不虚。”根据此诗，米芾不仅对此癖好自鸣得意，还曾自写了一幅《拜石图》以记录此事。这些米芾嗜石的佳话在后来的画家、诗人手下不断地被传颂，成为人所共知的典故。其间虽不乏传抄杜撰的成分，但也非无来由的瞎说。比如，米芾在丹徒的居所宝晋斋前就立有异石，其《书异石帖》曾记载此事。而相传由米芾开创的“瘦、秀、皱、透”四字相石法，至今仍然是鉴赏奇石的不二准则，这些都说明

米芾耽于此道的深度和见识。

米芾的另一个爱好是喜欢藏砚。米芾于砚素有研究，并著有《砚史》一书，对各种古砚的品样，以及端州、歙州等石砚的异同优劣，均有详细的辩论。米芾认为“器以用为功，石理以发墨为上”，这一原则今天仍然是品砚的基本原则。米芾平生对砚的惜爱并不亚于古书画，《宝晋斋法书赞》中有《山林集》一帖说：“辱教须宝砚，……砚为吾首，……”把砚视作自己的头颅，可谓惜爱之深。再如，米芾有一《紫金研帖》说：“苏子瞻携吾紫金研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静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此事发生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即苏轼北归后与米芾最后的见面之时，苏轼借去米芾的紫金砚后不久就去世了。对于苏轼这位已经去世的前辈的临终要求，竟不肯答应，颇有些不近人情。米芾于砚之痴，可见一斑。

因为有石癖、砚癖，米芾自然对砚山也极为重视。砚山是一种天然峰峦形成的砚石，其底部山麓处，琢平可受水磨墨。既可作为文房清玩，又能为临池染墨之具。相传，米芾得一砚山而抱眠三日。其中最著名的一座是南唐后主李煜之物，为结屋甘露而转让他人换得宅地一方。此后，米芾念念不忘此研山，因作有《研山图》传世。虽然这件绘画作品今天已经失传，但米芾另有一《研山铭》的大字书法传世。清人陈浩跋尾说：“研山铭为李后主旧物，米老平生好石，获此一奇而铭，以传之。”可证此事不虚。

从米芾的一些书帖中可以见出他收藏的砚山应该不少。比如作于元祐六年（1091年）的《篋中帖》中说：

“芾篋中怀素帖。如何。乃长安李氏之物。王起部薛道祖一见。便惊云。自李归黄氏者也。芾购于任道家一年。扬州送酒百余尊。其他不论。帖公亦尝见也。如许。即并驰上。研山明日归也。更乞一言。芾顿首再拜。景文隰公阁下。

这件尺牍是米芾写给他的朋友刘季孙的。米芾在信中说，自己最初打算以砚山等几件收藏品，来交换刘氏所收藏的王献之《送梨帖》。刘季孙得知苏轼喜爱米芾的砚山，也想以《送梨帖》来换取米芾的砚山并把它转送给苏轼、便答应了这笔买卖。但米芾的砚山被驸马王洙借去、久不归还，只好又写了这封信札给刘季孙，想改以怀素的书帖作为交换之物。元祐六年才是米芾个人收藏的起步阶段，已藏有此物，其后的人生中当有更多的砚山收藏自不难想象。

各种收藏之外，米芾还擅长古字画装裱。米芾总结自己的经验是：“余每得古书，辄以好纸两张，一置书上，一置书下，自旁滤皂角汁和水，霈然浇水入纸底，于盖纸上用活手软按拂，垢腻皆随水出。内外如是，续以清水，浇五七遍，纸墨不动，尘垢皆去。复去盖纸，以干好纸渗之两三张。”这是第一道的清洗工序。在其后的装裱过程中，米芾非常反对将古字画揭裱成两层的做法。如他所说的：“今俗人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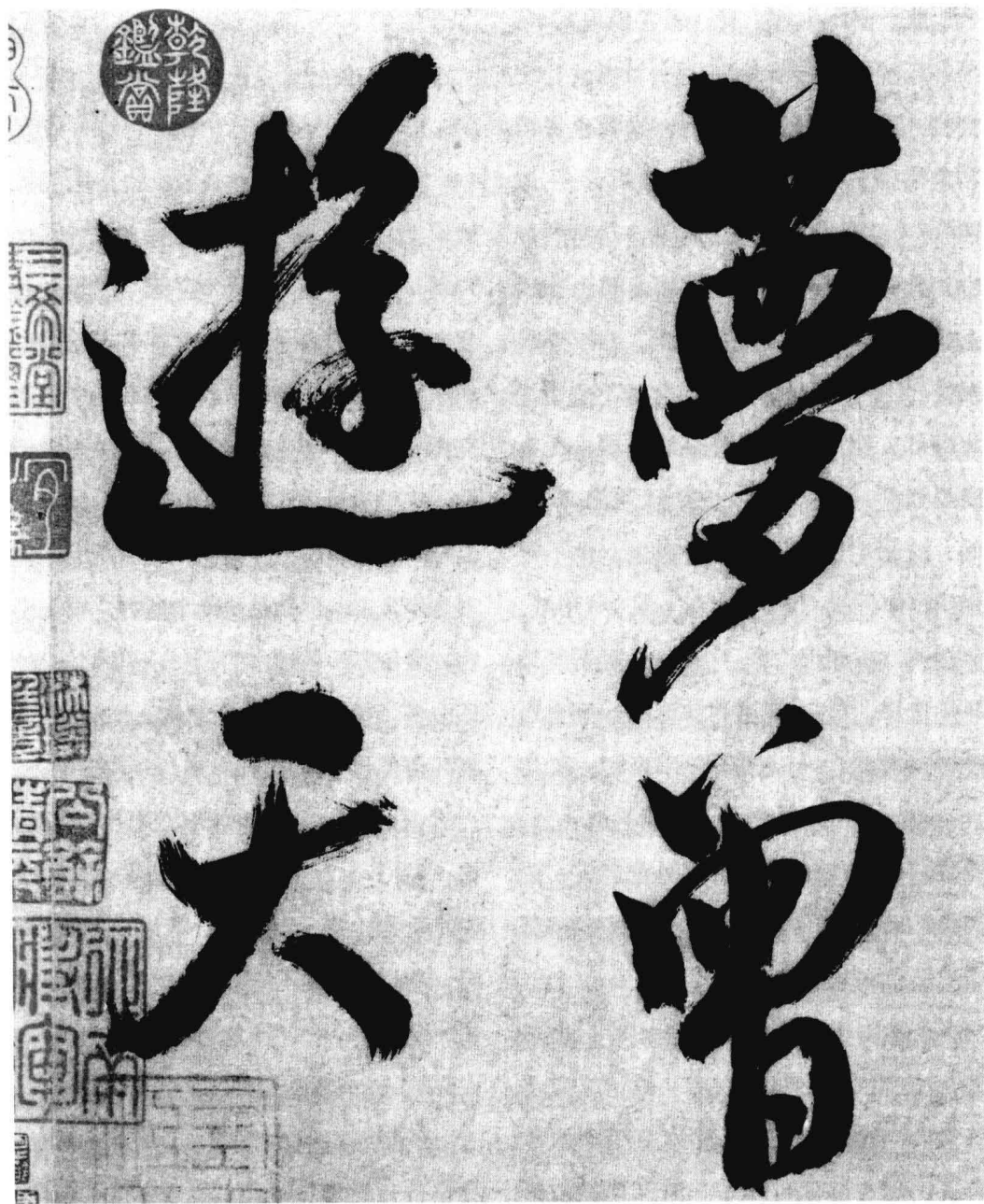
古厚纸，必揭令薄方背。若古纸去其半，损字精神，一如摹书。”另外，有关裱画材料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米芾也说得非常清晰：“纸上书画不可以绢背。”道理是：“盖取为骨，久之纸毛，是绢所磨也。凡背纸书画，日月损磨，墨色在绢上。”不仅裱背字画不能用绢，古字画破损处亦不可用绢修补，“装背画不须用绢补破处，用之，绢新时似好卷展，久为硬绢抵之，却于不破处破，大可惜。”又如，裱背完工之后的压条镶边，也不可用绢，原因是“不用绢压四边，只用纸，免摺背，重绷损古纸。”再如，对于装轴杆的选择，他说：“檀香辟湿气，画必用檀轴，有益。……轴不宜用金银，既俗且招盗。……水晶做轴，挂幅必两头坠，性重。”等等在这些细节之处的考究，皆来源于米芾生平的实践经验，他把这些都毫无保留地告知了后人。

米芾富于收藏，宦游外出时，往往随其所往，在座船上大书一旗“米家书画船”。黄庭坚曾题诗说：“万里风帆水着天，麝煤鼠尾过年年。沧江尽夜虹贯月，定是米家书画船。”米芾自己也有诗：“快霁一天清淑气，健帆千里碧榆风。满船书画同明月，十日随花窈窕中。”北宋由江南到汴京的运河水路，是当时最为繁忙的航线，也是米芾由镇江居所到京城必走的路线，沧江虹月和米芾的书画船往返于这条北宋帝国的大动脉上，使其风雅招摇的个性得到了最风光的展示，也就难怪米家书画船成了后代书画家们每每艳称的美事了。

(三)

米芾的一生或儒雅、或机敏、或沉沦、或戏谑、或无赖、或刁钻、或卑屑，总之可谓五味杂陈。但落实到后人的流传过程中，人们最容易放大的还是其放浪传奇的一面，甚至包括他去世前的种种表现也充满了浪漫与想象的成分。据相关资料记载，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米芾在淮阳军任上，头上生瘍。卒前一个月，作书告别亲友，尽数焚烧生前所好之书画奇物，准备好一香楠木的棺材，坐卧其中处理公务。前七日，不食荤物、沐浴更衣，临死作佛偈：“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人欲识去来，去来事如许。天下老和尚，错入轮回路。”偈罢，从容坐化。这种小说家语的杜撰，显然过于夸大了米芾的浪漫。在此，我们不能忘记《宋史》对米芾的一段重要评价：“不能与世俯仰”——这或许是对米芾一生最浓缩的概括。

米芾晚年居镇江丹徒，曾筑有山林堂，故名其诗文集为《山林集》，有一百卷，现大多散佚。米芾之孙米宪曾收集其散佚诗文及《书史》、《画史》而成《山林集拾遗》，后来岳珂又收集其著作成《宝晋英光集》一书。目前传世有《宝晋英光集》、《海岳名言》、《书史》、《画史》、《砚史》、《宝章待访录》等几部著作。这些著作情况不一，如《宝章待访录》系生前写好，有可能已刊刻；《书史》成书于其生前，是否刊刻未知；《画史》则有可能生前没有完稿。其他的著作则大多是后人辑录而成。另米芾还



多景楼帖（局部）

著有《评书十四家》、《十纸说》，前者为其早年论书著作，与《海岳名言》颇有差异；后者则专门论述唐以来十种纸张的性能、功用等等。二者皆不常见。

据蔡肇《故南宫舍人米公墓志铭》记载，米芾有五子。当代有的学者认为，他有八子、五女。但我们比较了解的只有其长子米友仁。友仁，小名尹仁、寅孙、鳌儿，字元晖，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出生，

仕至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友仁善书画、能传家学，人称小米。再则是早逝的米友知，颇精小字。《海岳名言》：“又幼儿尹知，代吾名书碑及手大字更无辨。门下许侍郎尤爱其小楷，云每小简可使令嗣书，谓尹知也。”另，米芾《题赠叔晦》提及：“仆之子鳌儿、洞阳、三雄。”“鳌儿”是米友仁，则其他二子为“洞阳、三雄”，至于余下儿子的具体名讳则无从知晓了。

米芾艺术成就分析

关于米芾一生的艺术成就，前人多有论述。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是，米芾的艺术渊源、艺术风格的变化轨迹以及其在书法史的地位影响。

米芾自叙：

“余初学颜（真卿），七八岁也，字大至一幅。写简不成，见柳（公权）而慕紧劲，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阳询），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遂良）而学最久。”（翁方纲《米海岳年谱》引米氏手札）。

对于这段话我们有必要详加说明。米芾出生之时恰值颜真卿书法在北宋艺坛开始得到广泛重视的时期。从米芾的文字中可以得知，蒙童学颜体、写大字应已成为当时的风气。所以，从颜楷入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遵从了当时的一般性习惯而已。值得注意的是，米芾学习颜楷的时间应该不算长，因为，发现学习颜楷而导致“写简不成”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而且，从米芾后来30多岁时期的作品来看，颜楷的影响微乎其微，几乎可以省略了。至于其后“见柳而慕紧劲”、“久之……乃学欧”——它们的一个共同前提肯定包含着“可以书简”的成分，由此亦可以推断，米芾早年的楷书临帖应当基本遵循着原帖

多大、临帖就多大的原则进行临摹的，颜楷较大、柳稍小而欧最小——这个由大变小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写简”的要求。由此断定，颜楷只是浅尝辄止而已（这或许是日后米芾对颜楷评价甚低的原因），学习欧、柳楷书才是米芾真正进入书法的第一台阶，米芾在此逗留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实际上，欧、柳楷书影响下的书写习惯一直到他30多岁时期仍然可以见出。比如，早年的一些作品如《三吴帖》、《法华寺诗》、《砂步帖》、《道林诗帖》等帖中依然保留着折角生硬，结字紧结纵挺的欧、柳楷书的书写习惯，就是一些非常明显的例证。

虽是学习了欧、柳字径较小的楷书，但毕竟楷书仍不方便于“写简”，于是，“余年十岁写碑刻，学周越、苏子美札，自作一家。人谓有李邕笔法，闻而恶之，遂学沈传师，爱其不俗。”这段叙述清晰地说明了米字行书的最初路径。或者说，一边临写欧、柳的楷书，一边临写上述书家的行草书——这应该是米芾早年的基本书法框架。这段话中，有两个问题需要详辩，其一是“学周越、苏子美札”。周越与苏子美（舜钦）都是宋仁宗时代声名非常大的书家，都擅长行草书。米芾以时人书法作为其行草书的第一阶梯，颇为符合一般学书者的功利性态度，但不是专门性书家